

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述评

陈晓兰

(上海大学 文学院, 上海 200444)

内容摘要: 从文学的城市地形学描绘、城市空间及环境研究、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观念、性别与城市再现、文学中的人群、大众与阶级形象等方面对于西方城市文化视野中的文学研究加以评述,分析了西方城市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问题。认为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城市史研究方法,从个体作家的文学城市地形学的研究、大都会文学地图的描绘到城市文学史的书写一直主导着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学的研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文学中的城市空间、风景、生态环境受到关注,同时,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主题也成为研究城、乡二元关系和相关的文化与伦理观念的重要资源;随着女性主义与大众文化研究的兴起,性别、人群与大众作为现代都市的主导意象受到关注,从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和美学意义等视角研究文学与大众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城市文学;城市地形学;城与乡;性别;阶级

中图分类号: I0-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2804(2012)06-0007-07

西方学术界将文学纳入城市视阈予以研究肇始于19世纪后期,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城市对于文学的影响,如作家的城市经验,作家的地方感及其自我意识,文学作为城市历史记忆的独特形式,文学中有关城市的社会组织结构与日常生活的独特再现,文学中的城市地形学价值,等等。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文学城市”丰富的知识价值受到其他学科的普遍关注。一方面,城市文学成为了城市生活史、城市文化研究乃至社会学研究的重要资料来源,另一方面,文学研究领域引入文化研究和社会学研究视角,通过文学研究城市文化,研究城乡文化和城乡观念,大都会的空间规划、社会结构、生活习俗、经济制度、金钱观念、法制秩序、社会抗议、暴力、犯罪、社会阶层、阶级观念、都市底层、贫困问题、两性关系、婚姻家庭、性别气质乃至公共卫生、建筑文化、居住理念等问题。现实主义的文学观与新历史主义思想杂糅,社会历史批评与文本分析方法相融合,一方面强调不同时期的城市文化对于作家生存状态、文学观念、文学形式、语言表达、文学传播等方面的影响;另一方面,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及其对于城市的想象、再现与型塑(configuration),文学城市(literary city)或者语词城市(word-city)与现实

城市(real city)之间的分离、反抗与再造,强调“不真实的城市”(unreal city)对于现实城市(real city)的话语化、秩序化与观念化的问题。城市研究与文学研究的交叉与渗透提出了新的问题,革新了文学研究的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而它所处理的问题,也不仅是文学研究和城市研究作为两个独立学科关注的问题,而且是关乎现代社会组织、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所有问题。

一、文学的城市地形学描绘与空间及环境研究

在西方学术界,从个体作家之文学城市地形学的研究,到城市(主要以大都会如伦敦、巴黎、纽约、芝加哥、柏林、彼得堡等为中心)文学地图的描绘,再到城市文学史的建构,反映了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城市文学研究的基本倾向和发展脉络,也一直主导着20世纪城市文学的研究。结合社会历史批评和传统的城市史研究方法,采用实证考据和都市地形学的描绘方式,研究文学史上与伦敦、巴黎、柏林、彼得堡、纽约、芝加哥等大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作家的城市生活及其城市观念,勾勒其文学作品中的城市地形图及城市意象,如对于

收稿日期:2012-03-19

基金项目:上海市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都市社会发展与智慧城市建设项目

作者简介:陈晓兰(1963-),女,甘肃张掖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比较文学研究。

狄更斯、巴尔扎克、雨果、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T·S·艾略特、乔伊斯、里尔克、德莱塞等作家的研究。

1870年狄更斯去世后,人们更深切地认识到这个著名市民的存在对于伦敦这个大都会的意义和价值。在英国出版了一系列提名为《狄更斯的伦敦》或《伦敦的狄更斯》的著作,如彭伯顿(T. Edger Pambertond)的《狄更斯的伦敦或狄更斯作品中伦敦》(*Dickens' London or London in the Works of Charles Dickens*, 1876)、理查德·阿伯特(Richard Albut)的《狄更斯的伦敦词典》(*Dickens' Dictionary of London*, 1879)、弗朗西斯·霍普金斯·史密斯(Francis Hopkinson Smith)的《在狄更斯的伦敦》(*In Dickens' London*, 1914)、瓦尔特·戴克斯特(Walter Dexster)的《狄更斯的伦敦》(*The London of Dickens*, 1923年初版, 1930年再版),等等,这些著作考证狄更斯在伦敦的居所、他的活动区域、散步地点及他的足迹所到之处,他作品中所描绘的区域、地点、风景及其人物生活、工作,甚至犯罪的地方,并探究这些地方、地点的地形学背景,表达了研究者对于狄更斯所记录的那些已经逝去的城市历史和经验的追寻与怀念。这种研究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的30年间,狄更斯与伦敦的研究处于沉寂阶段,直到70年代再度掀起热潮,狄更斯的作品成为研究19世纪有关伦敦问题的重要文献。在法国,随着19世纪50年代开始的大巴黎改造计划的实施和巴尔扎克本人的离世,巴尔扎克所描绘的地方在城市大改造进程中逐渐消失,巴尔扎克的作品成为了解巴黎现代化之前的城市地形、空间及建筑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文献。如乔治·伯纳德·莱瑟(George Bernard Raser)的博士论文《巴尔扎克作品中的巴黎》(*Paris in the Works of Honoré de Balzac*, 1935)对于巴尔扎克的巴黎经验及其作品中的巴黎再现的系统研究。从个体作家城市地形学的研究到城市文学社团和作家群的宏观描绘,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城市的文学地图、建构城市文学史。这些研究结合作家传记、区域文学、文学地理学、都市地形学和文学地形学的研究于一体,强调城市作为一种特定的地方对于作家的影响,以及文学、艺术及其他精神活动,作为地方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对于地方文化的建设意义,并在城市文化史的整体框架中建构城市文学史。

随着地方意识、空间理论和生态批评、环境批评的兴起,文学中的城市空间和物理环境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城市文学的研究重心从城市地形学的描

绘转向具体的空间、风景所具有的象征意义。空间理论和环境研究的引入使城市文学研究从地域概念过渡到空间概念,并将城市的物理空间及其中的社会生活实践相结合。作家作品中的城市景观、场景、地点、风景、自然环境等所体现的精神意义与叙述功能受到关注,研究小说中的物质空间与社会秩序、道德行为、生活方式之间的关系,空间的隐喻与语言、行为、事件的关系。作为生命之源的河流(如泰晤士河、塞纳河、涅瓦河),作为历史、传统、怀乡之象征的古迹、墓地,作为信仰、精神生活和传统道德之象征的教堂,作为权力和控制之象征的宫殿、帝王雕像、塔楼,与公、私生活相关的公共、私人空间,如广场、大街、花园、住宅,与都市边缘和反抗者相关的地下世界如贫民窟、地下室、作坊等,这些被作家精心构造的物质空间,作为人类生存处境和内在精神的具像化体现,在小说的叙述中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并被赋予了丰富的象征意义。如伊丽莎白·库格勒(Elizabeth Kugler)在《作为一种表演的散步:17世纪巴黎文学与风景研究》(*The Promenade as Performance: A Study of the Landscape and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Century Paris*, 1998)等,分析了作为独特的生活实践的都市漫步的丰富涵义,在大都市的漫步不再是达到某个目的的手段,而变成了目的本身,物理空间中移动的身体变成了一种视觉景观,成为物理环境的组成部分,影响了思维方式与自我意识。文学中最普遍的街道与游逛者也成为研究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街道作为艺术家和大学生活动的空间,同时也是精神上的放逐者和无家可归者的去处,一个人对于街道的熟悉与陌生体现了他与城市或疏异或认同的情感。史蒂芬·温斯伯(Steven Winspur)在其《论街道与叙述逻辑》("On City Streets and Narrative Logic")中分析了街道在小说叙事中的重要功能,认为所有都市文学都不得利用大街达到其叙述目的,大街是人物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人物通向目的地的途径。

空间研究几乎涵盖了城市空间的所有角落,如象征个人的位移或漂泊不定及社会流动性的旅馆,既是犯罪小说、城市喜剧和探秘作品的背景或故事现场,也是作家用以表现情欲的匿名场景,更是各种人物聚集、陌生人相遇、事件发生的地方,也是作为逃离法律制裁或政治迫害的避难所。作为学术文化中心的学院、大学、博物馆、美术馆;作为宗教、国家、权力、秩序象征的教堂、塔、摩天大楼、银行、医院(特别是精神病院)、法庭、监狱,等等。玛丽琳·托马斯·弗肯堡(Marilyn Thomas Faulken-

burg)的《勃朗特、狄更斯、哈代、巴特小说中的教堂、城市与迷宫》勾勒了小说中的教堂建筑与城市的关系,着重分析了19世纪英国小说中的教堂、圣地与避难所和神性的再现等问题。认为,19世纪以前,城市围绕着教堂建造,教堂不仅是城市地形学意义上的中心,也是生活、道德与文化意义上的中心,教会制定法律、行使法律,赋予城市生活以秩序。但19世纪的城市扩张对于教会的地位和权威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教堂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很难说,由于人类建造了城市驱逐了上帝,还是由于上帝消失了,人类才建造了城市,这两者总是结合在一起,城市中的生活也是一种方式,其中许多人直接体验了生活在没有神的世界里意味着什么”^{[1]①}。历史建筑、名胜古迹乃至废墟,体现了城市作为“历史的圣地”的精神特质,同时也体现了人类的有限性与时间的无限性,因此与人类的历史记忆、怀乡情结、幻灭感和自我认识密切相关。而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也往往是政治事件的发生现场,文学中的政治现场与象征着政治权力的纪念碑、凯旋门、国王雕像与陵寝,表达了作者的政治回忆及其对于权力的态度。普瑞斯勒·帕库斯特·弗格森(Priscilla Parkhurst Ferguson)的《作为革命的巴黎:书写19世纪的城市》(*Paris as Revolution: Writing the Nineteenth-Century City*, 1994)以巴黎为中心,研究了巴黎的精神生活和知识分子以及19世纪法国文学与政治、革命的关系,将19世纪法国文学的现代性和独特性定位于城市与革命的交互融汇中,认为19世纪巴黎的革命激情使这座城市成为引人入胜的文化思考对象,发生在巴黎的革命也成为这个时期的作家认识并再现城市的隐喻。

城市文学中的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研究,也是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问题。夏伦·马库斯(Sharon Marcus)的《公寓故事:19世纪巴黎和伦敦的家与城市》(*Apartment Stories: City and Hom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and London*, 1999)在家庭生活与都市的关系中讨论了英法现实主义小说与都市化的伦敦和巴黎之间的关系。他从英、法两国的家庭观念和居住习惯对于19世纪伦敦、巴黎居民住房规划和建造的影响为切入点,通过巴尔扎克、左拉和狄更斯等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研究了19世纪伦敦、巴黎的扩建对两个城市家庭观念和居住方式的影响。具体分析了欧仁·苏和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作为公私空间的公寓和狄更斯小说中独立的私人住宅,分析19世纪巴黎和伦敦人的社会关系和家庭生

活,通过居住空间分析了人的阶层归属感。如住在伏盖公寓的高老头在心理上归属于上流社会,实际上却属于中下层,他所居住的公寓既是他身份地位的象征,也是其家庭处境的表现。在一个建筑中包容了许多不同单元的公寓,为法国现实主义小说提供了一种多元性和统一性调和的可能,在小说的结构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使都市中的各种事件、多重叙述编织成相互关联的情节。在法国文学中普遍出现而在英国小说中较少出现的公寓,融合了公共与私人空间的功能,使个人的私生活暴露在他人的视线之下,表明了渴望对他人的理解正是大都会聚集性特征的产物。同样,在英国小说中对于隐秘的私人生活之神秘性、奇异性的描绘正是现实主义小说最基本的主题,通过对于隐秘空间的展示,揭示了城市中人的存在的隐秘性和多元性,现实主义小说融合社会类型与地形学的方式和全知全能的叙述,叙述者穿越城市对其各组成部分予以窥视,试图使都市生活的所有方面(包括私人家庭生活)变得透明。

二、文学中的城市与乡村观念研究

城市与乡村的关系一直是文学中的重要主题,自古希腊史诗《奥德赛》、赫西俄德的《工作与时日》、罗马帝国时期的讽刺诗至十八、十九世纪乡村急剧变革、城乡剧烈冲突时期的文学,都反映了城市与乡村作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空间和社会组织,从相互依赖到冲突对立的历史演变以及城乡观念的历史性延续。拉尔夫·马克·罗森(Ralph Mark Rosen)等学者在《古典时期城市、乡村与价值的空间组织》(*City, Countryside, and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Valu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2006)中,将考古学、肖像学、文学与哲学研究相结合,分析了古希腊、罗马文化中的城乡二元对立以及相关的文化与伦理观念。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在欧洲的广阔背景中,以英国文学为主体,描绘了城市与乡村的历史演变,文学家的城乡观念及其文学意象。他指出:“城市与乡村是两个强有力的词汇,在英语中,‘country’一词是‘民族’(nation),也是‘国土’(land)的组成部分,‘the country’则指整个社会或它的农村地区。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在人类漫长的居落史中,人类直接或间接地与赖以生息和造就人类社会的土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城市就是人类社会的成就之一:首都,大的城镇,是一种完全不

① 本文所涉及到的外文文献均由本文作者翻译。

同的文明形式。人类对于城市和乡村这两类聚落形式的强烈情感也存在着惊人的差异并具有普遍化的特征,乡村被视为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具有和平、纯洁和朴实的美德。而城市,则被视为学术、交流的中心和光明的所在。”^[2]同时,乡村与城市又都被赋予了负面的意义,城市喧嚣、世故,充满了野心,乡村则意味着落后、愚昧和局限,即使自18世纪以来,英国的乡村和农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英国人对于乡村和农业生活的传统观念依然具有强大的力量,即使在整个社会已经完全变成工业化和都市化社会,文学,仍然以乡村的立场看待城市。至19世纪末,英国农村被视为城市的附属,但是,整个国家的历史、文学,却与乡村经验密切相关,关于美好生活的理念依然与乡村相关。威廉斯通过简·奥斯丁、埃米莉·勃朗特、乔治·艾略特、哈代、亨利·詹姆斯及梅瑞狄斯的“乡村宅邸小说”,分析了文学家的地域观念,绿色的语言、风景描写、田园情调以及乡村社群、人际关系、爱欲的隐喻等等。在他看来,这种对于自然的描写和有关乡村生活的回忆、观察和再现,表明了在农村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时期,作家们对于已逝的过去的沉湎与怀念。十八、十九世纪英国城市的巨大变革和迅速扩张,城市变成了新的风景、新的社会,但却很难把新的城市与传统相隔离。文学家们依然将“纯洁的乡村和有罪的城市”相对照^[2]¹⁴⁴,对于工业和城市也表现出复杂的矛盾情感,一方面憎恶工业的非人化,另一方面又赞美丰产,原先赋予土地的品性现在赋予了工厂,对丰饶多产的工业的赞颂引申到对城市繁荣的赞扬,城市意味着文明、秩序、安全、繁荣、礼仪、幸福,同时,又用传统的道德话语审判城市,批评城市的拥挤、紧张、混乱、虚伪、空虚、浮华和贪婪对于城市秩序的威胁。这种矛盾体现在伏尔泰、亚当·斯密、蒲伯、约翰逊、贺加斯、盖倚、笛福、菲尔丁、布莱克、克莱尔、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狄更斯、盖斯凯尔夫人、马克思、恩格斯、哈代、威尔斯等作家对于城市的观察和体验以及他们各不相同的城市观念和文学再现中。此外,受威廉斯影响,杰拉尔德·麦克林恩(Gerald Maclean)等主编的《重访乡村与城市:英国与文化的政治,1550—1880》(*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Revisited: England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1550—1850*, 1999),回到威廉斯最先探讨的基点,即城市与乡村的问题,检验英国现代化时期的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考察这个历史阶段英国的社会转型。认为在1550—1850年的300年间,是英国商业主义的伟大时期,英国从乡村为主体的国家

发展为城市为主体的国家,从一个因语言和封建制度而分散的地方和社群,发展为强有力的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大都会伦敦对于英国人的国家想象和社会观念起了重要的作用。与此相关,与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对的外省或地方受到学界关注。随着国家进入现代时期,具有田园牧歌传统的地方文学表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地方与外省代表着本土与传统,地方文学表达了现代人的怀乡之情,与代表着变革、现代与国际主义文化中心的大都市文学形成鲜明的对照。

三、性别与城市再现

随着20世纪6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在各研究领域中的渗透,性别问题成为有关社会史、文化史、医学史、法律史和公共卫生改革研究不可忽略的问题。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艺术史家和文化研究者批评以往城市文化与现代性研究中对于性别与性的盲视,认为性别问题,尤其是性的问题,是都市社会与文化研究中不可忽略的问题,女性的身体在都市空间和视觉领域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丰富象征意味的堕落妇女(妓女)一直是表现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的重要修辞手段。在男性的想象中,城市被视为女性,或者通过女性表现城市,通过男人与女人的关系喻指男人与城市的关系。因此,在城市的艺术再现中性别具有重要的作用。

玛莎·麦斯基蒙(Marsha Meskimmon)在对于魏玛共和国时期柏林及汉堡的视觉艺术、女性艺术家、都市卖淫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在男性气的现代性想象中,只有妓女的再现而没有女士(lady)的位置^[3]。夏伦·马库斯的《公寓故事》对英、法小说中的公、私空间研究同样引入了性别的视角。认为小说通常都将流动和观察的专利赋予男性,而使女性成为被男性观看的性感对象,女性的出现总是与同男性的性接触有关,在一个城市中,几乎每一个地方都变成了公开调情的地方。女性不仅在大街上被观看,男性冒险者在城市的某个公寓里与一个女人的约会和接触,成为都市生活的一种标志,这种短暂临时、朝生暮死、脆弱易变的关系,也是城市流动性特征的表现。“男性占有在大街上或者建筑物中相遇的妇女,就如同他们对城市财产的临时占有有一样,是租赁而非长久的拥有。如同男性有产者出租、交换建筑物和土地一样,他们也可以占有、交换、出租女性。公寓房就如同女人的身体,二者都是男性财产的合法标志,二者都被置于公共领域而非

私人领域。家庭私人空间中的女性是某个男人拥有的财产，而进入公共空间的女性则成为其他男性临时租用的对象，进入公共空间中的女性，常常被视为道德堕落的女性（妓女或邪恶的公寓女老板），或者被追逐、处在危险边缘。”^[4]因此，许多文本也把妇女与城市混为一谈，把城市塑造为女性，巴黎街道的性感化和都市观察者强烈的性别意识，实际上强化了而不是忽略了女性在都市观察中的影响力。托维·芬斯特（Tovi Fenster）在《性别与城市：不同归属的形成》（*Gender and the City: The Different Formations of Belonging*, 1999）中分析了城市空间、社会归属与性别身份认同的关系。认为，人们所处的空间与社会归属感和公民身份感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反过来，空间归属又深受社群、文化、种族与性别观念的影响。在城市中，男女两性有不同的归属空间，从女性的空间归属就可以感受到一种文化价值对女性的排斥，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离，意味着女性被允许和被禁止的空间，家是私人的、女性的空间，也是稳固、可靠的空间，与此相对的是旅馆、公寓，介于家和公共空间之间，而与政府服务、教育相关的公共空间则是白人中上层阶级、异性恋的男性统治的空间，在许多社会，妇女只出现在私人空间，如果出现在公共空间或在城市闲逛，就会被视做妓女。

阿兰·罗宾逊（Alan Robinson）的《意象伦敦 1770—1900》（*Imaging London, 1770-1900*, 2004）是对19世纪英国商业资本主义与性别气质关系的研究，通过狄更斯、特罗洛普和亨利·詹姆斯等作家作品及19世纪后期的绘画，考察了18世纪末及整个19世纪英国商业主义和伦敦的自由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秩序、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消费不再受法律和宗教限制，生活方式和社会身份由购买力来决定，文化权威受到质疑，伦敦父权社会中的性别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经济和法律对于妇女的限制不仅只针对那些被视为传播疾病、威胁身体健康和败坏社会道德的“妓女”，上层社会的妇女同样遭遇了来自经济和法律的限制，而商业和物质也同样改变了男性气质，文学中的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对于中产阶级家庭及新的两性气质的形成、新英雄形象的确立和绅士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艾玛·利金斯（Emma Liggins）在《乔治·吉辛：职业妇女与都市文化》（*George Gissing, the Working Woman and Urban Culture*, 2006）通过维多利亚晚期最重要的城市小说家乔治·吉辛的作品，考察了维多利亚后期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女

性从婚姻中退出而走向社会进入男性主导的工资领域，并要求在公共领域和大街上行走的自由，是19世纪都市化的新现象，不仅颠覆了既定的社会道德秩序，打破了传统的公、私领域的性别划分，对于女性而言，不仅开创了新的生活，也面临着种种危机。文学作品借鉴当时有关职业女性的社会调查，为不同的读者展现了这一新现象。吉辛的小说全面描绘了妇女的工作，从妓女、酒吧女郎、演员到工厂女工、店员、办公室职员、女医生、女商人、女记者，等等。认为小说表现出鲜明的保守倾向，表现了传统女性的死亡，具有自由、平等意识的女性所付出的生命代价。吉辛作为现代城市的杰出小说家，“秉承自然主义的传统，在新女性文类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关注由现代性和商业文化所产生的性别主体性和阶级问题。”^[5]他的小说深受同时期法国小说的影响，关注商业、广告、消费对于女性的诱惑，集中反映了性别与资本主义和城市的关系及现代性的女性化问题。

都市女性的危险处境和文学中的道德隐喻、女性都市主义（female urbanism）、女性游逛者、两性关系、婚姻家庭、性别气质以及性别与阶级分化的关系等是关心十九、二十世纪城市中的性别问题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重点研究的问题。

四、文学中的人群、大众与阶级形象

在十九、二十世纪，人群（crowd）及大众（mass）不仅是一种都市景观，而且成为了一种被强烈意识到的社会现象。在文学、艺术中，人群也是思考现代性的重要维度和表现都市生活的主导意象。在文学与文化批评中，考察十九、二十世纪作家对于现代都市各种类型的公共人群的体验，研究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派文学与大众政治的关系，对于文学、艺术中的人群意象进行社会学、心理学、修辞学和美学意义上的研究。如玛丽·伊斯蒂夫（Mary Esteve）《美国文学中大众的政治学与美学》（*The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of the Crow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2003），安德鲁·弗兰特（Andrew Franta）的《浪漫主义与大众社会的兴起》（*Romanticism and the Rise of the Mass Public*, 2007）以及约翰·普洛茨（John Plotz）的《人群：英国文学与公共政治》（*The Crowd: British Literature and Public Politics*, 2000）等。这些著作的论题涉及十九、二十世纪英美作家对于公共政治和个人判断的观念、知识分子对于大众的态度和大众的文学

再现等问题。阿兰·斯威伍德(Alan Swingewood)的《大众文化的神话》(*The Myth of Mass Culture*, 1977)将19世纪的英国工人阶级小说纳入大众文化的研究视野,认为:“英国小说的主要传统(资产阶级的写实主义)要么就是略过工业界的无产阶级不谈,要不就嘲弄一番……就整个英国小说的大传统而言,当时新近崛起的工人阶级如果不是缺了席,就是以‘暴民’(mob)而非‘阶级’(class)的面貌出现:我们在盖斯凯尔夫人的《北与南》和《玛丽·巴顿》、狄更斯的《双城记》都可以发现这样的描写。18世纪对于乌合之众所具有的观感,正是没有教养、处于原始状态的懵懂,行为不理性而不知节制,在这些19世纪的小说中都可以找到踪迹……19世纪的主流小说,否定了工人阶级,认定他们不可能自谋像样的政治或文化的独立组织;工人阶级若不是被说成暴民,就是被描写成大体是消极被动,单重实用而不知计划,根本无力创造民主与政治上的反对运动,只能受制于统治阶级。”^[6]约翰·凯里(John Garey)在《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 1992)中着重分析了1880—1939年间英语知识界对于大众文化兴起的反应,批判19世纪至二战爆发时期英语知识界的反大众倾向。认为尼采、福楼拜、易卜生、哈代、劳伦斯、托马斯·曼、黑塞、纪德等作家都表现出鲜明、激烈的反大众的观点。在乔治·吉辛的作品中,粗鄙、放纵的大众难以教化,艾略特在《荒原》中“暗示伦敦群众并非真的活着”^[7]¹²。凯里认为:“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是围绕着这样一个原则形成的,即排斥大众、击败大众的力量、排除大众的读写能力和否定大众的人性。”^[7]²³约翰·普洛茨的《人群:英国文学与公共政治》涉及公众政治理论和19世纪英国文学中的种族、阶级、性别、空间和社会秩序等问题。认为,在1800—1850年间,人群,作为喧嚣的大街生活和政治表现,不仅催生了以伦敦大街上的人群为表现对象的小说,而且改变了英国对于公共和私人空间的观念,“1800—1850年代的英国文学对于公众中的人群的再现反映了有关人群的语言和观念问题及相关的论争。纪录了历史记载没有提供的这个时代人群的特征”^[8]³。伦敦的人群为华兹华斯提供了完全不同的诗歌创作灵感,他的《序曲》表现了文学抵制城市人群非人性化的力量,再次确定了诗歌控制混乱的能力。艾德伍斯的《哈林顿》汇集了各种人群,而中心则是威胁着伦敦的最大的暴力群体:1780年反天主教的戈登叛乱,集中表现了作者对于大众政治的态度。勃朗特的《谢莉》在19世纪40年代宪章运动的背景下,表达了建构社

会空间和秩序的新方式。

在这些著作中,大众是一个外延广泛的抽象概念,非知识分子阶层和非贵族的中、下层阶级都被归入大众的行列。与大众相关的研究不仅包括都市底层、工人阶级、乞丐、妓女等社会边缘阶层,也涵盖资产阶级,如资本家、金融家和中等阶级中的各种职业类型,如律师、办公室职员,等等。与此相关,文学中的贫困也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之一。工业化使贫困的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贫困不再是一种美德,而是一种社会罪恶和外人处境的象征,因此,贫困不仅变成了一种社会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社会贫困是19世纪作家必须面对的问题,具有人道主义关怀的作家通过再现社会边缘和底层的贫困,批判失败的政治统治和不正义的社会,将贫困隐喻化、象征化,底层社会的贫困、阴暗与资产阶级的奢华辉煌相对照。文学家对于贫困的体验、想象、再现与小说的美学原则以及作家的政治观念、社会想象受到评论界关注。对于中产阶级的文学想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中产阶级作家的阶级身份认同感,研究作家如何在小说中表现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都市穷人、工人阶级、乡下人)的差别感,考察中产阶级作家对于社会阶层、身份地位以及社会等级体制的态度和阶级身份认同,论题涉及商业和资本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以及文学中对于经济、商业、财富、资本家与金融家、社会阶级结构的再现。斯蒂芬·汉考克(Stephen Hancock)《维多利亚小说中浪漫的崇高与中产阶级的主体性》(*The Romantic Sublime and Middle-Class Subjectivity in the Victorian Novel*, 2005)分析了中产阶级的兴起带来的传统的崇高观念的转型,涉及道德权威与崇高的关系,大众的崛起与自我的消失,小的意义与小的崇高,中产阶级的性别观念、家庭观念、道德权威对于崇高感的影响,等等。雷蒙德·吉拉德(Raymond Giraud)的《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小说中非英雄的英雄》(*The Unheroic Hero in the Novels of Stendhal, Balzac and Flaubert*, 1957)分析了19世纪法国作家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恶,认为:“自拿破仑时代以来,所有的作家都表现出对于当代法国社会的不满,这反映了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憎恶,在古代,法国的资产阶级一直被看不起、受嘲笑,但却从未像19世纪中期那样受到如此的鄙视和公开、猛烈的攻击。这种新的反资产阶级的感情并不是早期情感的回声,而是政治、社会、经济变迁和社会转型的产物。随着这种变迁,作家(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对过去的怀恋和对文化

转型的憎恨在浪漫主义作家中间产生了孤独感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感觉,他们对社会的不满、憎恶与对资产阶级的痛恨一直延伸到今天。”^{[9]3}司汤达、巴尔扎克和福楼拜的小说塑造了不同的英雄人物,表现了不同的英雄主义观念,“古老的贵族英雄主义理想在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显得滑稽可笑,现实主义与英雄理想在19世纪的浪漫小说中激烈冲突,而正是从这种冲突中产生了新的英雄类型,他们来自于中产阶级,但这些英雄充满了矛盾,是现代社会中悲剧性的不合时宜的人,充满活力但缺乏力量,感伤而孤独,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抗议和妥协,他们不是浪漫的恶棍和反英雄,而是粗俗社会中复杂的、感伤的个体,通过这些英雄人物,表现了

社会的道德问题,反映了反资产阶级的作家们的矛盾,在他们看来,孤独和感伤不可能成为资产阶级,而实用主义的大资产阶级也不可能成为英雄。”^{[9]185}

以文学为对象探讨以往属于历史、社会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课题,扩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模糊了文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但并不意味着忽略文学本身的独特性和主体性,在城市文学的研究中,既重视都市文化对于文学观念、作家经验、文学类型、主题及表达方式、语言风格等的影响,又强调文学想象、再现、话语对现实城市的塑形和反作用,“文学城市”、“语词城市”被普遍运用,强调文学中“非现实”(unreal city)的、虚构的城市和城市被“观念化”、文本化的问题。

参 考 文 献

- [1] Faulkenburg M T. Church, City and Labyrinth in Brontë, Dickens, Hardy and Butor[M]. New York: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1993: 1-2.
- [2] Williams R.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3] Meskimmon M. No Place for a Lady: Women Artists and Urban Prostitution in the Weimer Republic[G]//Spier S, ed., Urban Visions: Experiencing and Envisioning the City.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2: 38.
- [4] Marcus S. Apartment Stories: City and Home in Nineteenth Century Paris and London[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39.
- [5] Liggins E. George Gissing, the Working Woman and Urban Culture[M]. Alb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6: xix.
- [6] 阿兰·斯威伍德. 大众文化的神话[M]. 冯建三,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68.
- [7] 约翰·凯里. 知识分子与大众[M]. 吴庆宏, 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2008.
- [8] Plotz J. The Crowd: British Literature and Public Politic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3.
- [9] Giraud R. The Unheroic Hero in the Novels of Stendhal, Balzac and Flaubert[M].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Review of Western Literature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rban Culture

CHEN Xiao-lan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This essay is a report and review on an investigation of urb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studies in Western countries in 20th century, concerning such aspects as urban topography, urban space and environment, cities and villages in literature, gender, urban revitalization, masses in literature, and stereotyped images of mass and class. It cuts into the issues of critical consciousness and methodology essential in the study of Western urban literature. From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00s to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study of Western urban literature had been dominated by a linearly patterned structure from individual author's urban topography to the depiction of metropolitan literary map and the history of urban literature, combined with socio-historical criticism and traditional urban history studies. Since 1960s, critics paid more attention to such concepts as space, scenery, and bi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fictional depiction of cities and villages became the reference sources for social and anthropological studies in terms of the b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cultures and moral issues. As feminism became more and more popular, gender, cohorts, and masses as ideological bodies drew more atten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ass politics has been approached from such various perspectives as of sociology, psychology, rhetoric, and aesthetics.

Keywords: urban literature; urban topography; the urban and the rural; gender; class

(责任编辑: 李向辉)